

傅修延学术研究的跨学科特色论析

On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Fu Xiuyan's Academic Research

龙迪勇 (Long Diyong)

内容摘要: 傅修延的学术道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济慈研究, 之后兴趣逐渐转向叙事学研究, 同时还将研究江西本土的文化当作自己的使命, 坚韧而执着地进行“赣鄱文化”的研究。他有着全球性的视野和比较眼光, 在研究中尝试突破以往的研究对象、治学格局, 打通中外, 融会古今, 广泛使用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理论, 并首次提出听觉叙事的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理论体系, 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及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穿梭在不同的研究领域, 但始终秉持“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基本立场, 尝试突破学科界限, 念兹在兹地思考各种可能性。无论是最初对济慈书信的翻译及研究、对赣鄱文化的关注及践行, 还是多年来开展的中西叙事比较研究, 傅修延始终坚持本土立场, 在研究中保持一以贯之的中国立场及对现实的强烈关切。

关键词: 济慈研究; 赣鄱文化; 听觉叙事; 中国叙事学; 跨学科特色

作者简介: 龙迪勇, 东南大学首席教授, 主要从事叙事学、图像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空间叙事体系研究”【项目批号: 23&ZD278】、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艺术叙事学研究”【项目批号: 24VRC07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Fu Xiuyan's Academic Research

Abstract: Fu Xiuyan's academic career began in the late 1970s with his research on John Keats. His interests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 narratology, while he also embraced the mission of studying Jiangxi's local culture, persistently and diligently dedicating himself to the exploration of "Ganpo Culture." Possessing a global vision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u Xiuyan sought to transcend traditional research subjects and academic paradigms in his work. He bridged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integrated ancient and modern insights, and extensively employed theories from anthropology, religious studies, linguistics, semiotics, folklore,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He pioneered the concept of auditory narrative and established its initi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more cohere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narratological studies. While navigating diverse research fields, Fu Xiuyan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a principle of keeping Chinese context central while adopting global perspectives. He endeavored to break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remained deeply engaged in exploring diverse scholarly possibilities. Whether through his early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Keats' letters, his enduring commitment to Ganpo Culture, or his decades-long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s, Fu Xiuyan has steadfastly maintained a local standpoint. His research consistently reflects a distinctly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a strong commitment to practical concerns.

Keywords: Keats Studies; Gan-Po Culture; Auditory Narrative; Chinese Narratology;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Author: Long Diyong is Chief Professor and Senior Professor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narratology and iconology (Email: ldy7073@126.com).

20 世纪 60 年代末，受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正式诞生。自诞生以来，叙事学虽然也曾走入低谷，但总体上却凭借自身的理论活力和学科渗透力，呈现出了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态势。就拿我国的情况来说，自新时期以来，叙事理论一经引进，就开始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不仅各种相关专著和译著相继出版，而且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的数量也位居前列。近年来，不仅文学叙事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许多学者开始以跨学科、跨媒介的视野和方法，对叙事学进行更为宏阔、更深层次的研究，傅修延教授即是其中的先行者和佼佼者。

我本人自多年前进入叙事学领域，从“空间叙事研究”到之后的“跨媒介叙事研究”，也一直尝试着从各学科及各艺术门类之间的跨界现象出发，力图对叙事学研究探索新的可能性¹，其中就多次受到傅修延教授的勉励并深受其研究的启发。作为国内最早关注叙事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比较诗学与叙事学界人士的重视。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思考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带着跨学科的宏阔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叙事传统，在研究中尝试突破以往的研究对象、治学格局，打通中外、融会古今，广泛使用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理论，并首次提出听觉叙事的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理论体系，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及更为合理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维视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并不仅限于他的叙事学研究，而是始终贯穿于他的济慈研究、赣鄱文化等研究领域之中。本文拟综合考察这些研究领域，探讨傅修延学术研究的跨学科特色。

1 关于本人的空间叙事研究和跨媒介叙事研究，可参见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和《跨媒介叙事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 年）。

一、傅修延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底色

傅修延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叙事学与赣鄱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跨学科是其学术研究的底色。他本科阶段学的是外语，之后考入中文系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后又在工作之余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曾先后两次出国访学，向西方学习又回到东方，始终立足于本土，通过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及融会贯通，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建构适应本民族的文学理论，尤其是适应中国叙事传统的叙事学理论。

傅修延的学术道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济慈研究，用他的话说济慈是他学术研究上的“初恋”。¹ 他的硕士论文“济慈美学思想初探”是他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从事济慈研究的发轫之作，该文后来收入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20 世纪 80 年代，他发表了一批关于济慈的研究文章，如“美的赞歌——读济慈的几首诗”²，以及“‘亘古奇才未尽年’——论济慈与李贺”、“在美女蛇的故事后面——〈拉米亚〉与〈白蛇传〉”³等，这些论文标志着他从事济慈研究的起步阶段。⁴ 由于对济慈的情有独钟，促使了他翻译出版了《济慈书信集》（*John Keats' letters*, 2002）一书。⁵ 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济慈书信全译，他在该书“译序”中写道：“爱是不能忘记的，学术研究上的‘初恋’同样铭心刻骨，将济慈书信译出来奉献给自己的同胞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济慈书信集·译序》11）。2006 年，他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获准立项，为了做好此项研究，他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于 2006-2007 年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英语系做访问研究。这段访学经历及其对济慈充分的前期研究，为他之后的《济慈评传》奠定了可靠的学术基础。济慈传记在西方有多种版本，但出自于中国人笔下的这还是第一部，为此他查阅了大量资料，挑选出最能反映济慈精神面貌的事件进行叙述，在研究中还特别注意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进行阐发。这部传记也为课题“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的最终完成铺平了道路，他于 2014 年出版的《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为这一课题的

1 参见 林瑛：“文学研究的中西比较自觉意识与文化自信傅修延教授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2019）：9。

2 参见 傅修延：“美的赞歌——读济慈的几首诗”，《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五集），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9-20 页。

3 参见 傅修延：“‘亘古奇才未尽年’——论济慈与李贺”“在美女蛇的故事后面——《拉米亚》与《白蛇传》”，《比较文学三百篇》，智量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第 661-665 页，第 701-704 页。

4 参见 傅修延：“引言”，《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7 页。

5 参见 傅修延：“译序”，《济慈书信集》，约翰·济慈著，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年，第 11 页。

结项成果。¹截至这本书出版之前，国内尚无系统的济慈研究专著问世，后来这本书被成功选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专著中，傅修延提到其研究中恪守的几个原则，其中一条是从谱系学角度观察有影响人物对济慈观点的“跟进”与“接着讲”，其次还要注意济慈的精神馈赠属于全世界，我们的目光不能只投向西方，在研究中应注意运用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必要时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²这种具有明显跨文化、跨学科意识的研究方法，与他彼时的叙事学研究方法紧密相关。

傅修延关于叙事学方面的研究正式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而他对叙事学产生兴趣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赴多伦多大学访学时就已经开始了。他在多伦多大学比较文学中心的卢波米尔·多罗泽尔教授那里第一次听到了“Narratology”（叙事学）这个词，在一次听完多罗泽尔教授情绪激昂的讲课后，他萌发了写作《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1993）这本书的愿望。在这本书中，他既对接了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又从中国文学的创作实际与批评实践出发，思考了“叙述之所以为叙述”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在具体讨论中，他还注意到以跨学科方法来研究“叙述”，比如在第九章中他提出要像看待音乐那样看待叙述，在第十章中还将叙述与数学挂钩，大胆地打破学科壁垒，突出艺术之围。在他看来，人类的叙述活动永无休止，这本书只不过探讨了一些最基本的叙述问题，还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等待着他去“叙述”。³而接下来的出国访学经历，让他亲眼看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他认识到西方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西方之外的许多现象，因而开始反思自己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行为。就此意义而言，这本书成了他“立此存照”——展示自己学术转向的一个路标，从那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对域外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将其作为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参照系统。⁴在国外异质文化的包围中，他意识到就像自己的肠胃很难消化牛奶面包一样，真正对自己胃口的还是本民族的文化。这种感觉后来一直伴随着他，并未因他的回国而消失，相反却与日俱增导致了其学术阵地的“本土化”。⁵他花了大量时间补习国学，增强古代文论方面的修养，取得了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并近乎执拗地选择了离原来专业最为遥远的先秦叙事作为其学位论文题目。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1999）一书大大突破了文学的范畴，致力于研究先

1 参见傅修延：“引言”，《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2 参见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3 参见傅修延：“后记”，《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4 参见傅修延：“修订版后记”，《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年，第294-295页。

5 参见傅修延：“后记”，《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321-322页。

秦时期诉诸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叙事形态，“雅俗一体”“史稗不分”“韵散同举”“三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连锁”。¹除了叙事理论之外，他还借鉴了一些发生学的观点，认为叙事传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研究中带一点生物进化的眼光，有助于更清晰地勾勒出叙事传统的形成脉络。²

作为“文革”后国内首批培养的外国文学研究生，傅修延对西方文论也有较早的涉猎，对文本主义文论尤为关注。他之前出版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叙事：意义与策略》（1999）等书，构成了他之后的《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2004）一书西学部分的工作基础。³他在这本书中提出，在讨论文本学或文本理论时，不能将视野局限于西方一隅，只有海纳百川、兼顾中外，从跨学科的视野，将东西方文论都当作理论建构的基础资源，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新世纪的文本学。⁴

也正是在世纪轮替之时，部分中国学者将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介绍到中国，国内慢慢形成了一股叙事学研究的热潮。进入21世纪，傅修延又陆续发表了“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听觉叙事初探”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叙事学做了具体探索，这些成果大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的“叙事学专栏”上。⁵随着这些“材料”的日积月累，他于2015年出版了《中国叙事学》这部浸透着他多年心血的著作，并按照“初始篇”“器物篇”“经典篇”“视听篇”和“乡土篇”这样的框架将它们纳入该书的整体框架中。与以往关于中国叙事学的研究不同，傅修延没有只将精力集中在小说、戏剧等文类上，而是带着跨文类、跨学科的宏通视野，来看待并梳理、发掘中国的叙事传统。为此，他提出了探寻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创新之途，其中特别强调了“调查范围的扩大”，即叙事并非只诉诸语言文字这一种媒介，如果一味依赖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本，忽略汇入叙事长河的其他源头活水，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除此之外，他还提倡要注意“研究范式的转换”，即突破学科界限，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相糅合，从人类学、宗教学、符号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

1 参见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2 参见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7页。

3 参见 龙迪勇：“文本与文本主义文论——读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创作评谭》2（2005）：49-52。

4 参见 傅修延：“绪论”，《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5 参见 傅修延：“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9（2007）：26-38；傅修延：“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江西社会科学》5（2008）：23-44；傅修延：“元叙事与太阳神话”，《江西社会科学》4（2010）：26-46；傅修延：“听觉叙事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2013）：220-231；傅修延：“互文的魅力：四大民间传说新释”，《江西社会科学》4（2014）：205-214。

相关领域广泛征求工具与材料,以探明和捋清中国叙事的谱系。¹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尝试从听觉维度重新审视中国叙事传统,以“听觉叙事”响应文学内部因听觉缺位而郁积的理论诉求。而关于听觉的兴趣,其实在他博士论文时就已经产生了,他还在论文中单列了“声音与音乐”一章。²之后,他更是将“听觉叙事”单独拈出来做专题研究,并于2013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听觉叙事研究”立项。经过近十年的学术探索,傅修延将其关于听觉叙事的所思所想整理成《听觉叙事研究》(2021),从声学、语言学、文学符号学等角度,探讨听觉于人类历史上在交流、感知和文艺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该书“自序”中,傅修延指出:叙事一开始便与听觉结下不解之缘,而这是他从人类学那里得到的启发——在早期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主要靠讲故事维系群体、营造群体感和认同感。他还引用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恢复视觉之外的感觉”以及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等人对听觉空间的开拓性叙述,指出听觉叙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人的感官都恢复原初的敏感。在文学意义上则是通过弘扬听觉的艺术价值,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³在其后的《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共七卷)中,傅修延更是首次以感官倚重角度入手来阐述中西叙事传统的不同,认为中西叙事的不同归根到底是因为中西文化在视觉和听觉上各有倚重。他引用人类学的观点,认为孤立地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是没有意义的,要想真正懂得中华民族的叙事传统,就要将其与域外的叙事传统相互映发。⁴在具体的研究中,他突破了以小说为叙事学主业的路径依赖,将考察对象范围扩大,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握中西叙事特征及差异,试图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叙事学体系。

生态叙事也是傅教授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与他的“赣鄱文化”情结紧密相关。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傅修延一直在为赣文化的振兴奉献自己的力量。他曾先后主编了《赣文化:从大京九走向二十一世纪》(与邹道文共同主编,1997)、《江西文化》(与卢普玲共同主编,2018),出版《赣文化论稿:留住我们的集体记忆》(2004)、《生态江西读本》(2019)等专著。⁵除此之外,他曾经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生态叙事和生态文化的相关问题,结合传播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本质

1 参见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 参见傅修延:“后记”,《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23-424页。

3 参见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4 参见傅修延:“总序”,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15页。

5 参见邹道文、傅修延主编:《赣文化:从大京九走向二十一世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傅修延、普玲编:《江西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傅修延:《赣文化论稿:留住我们的集体记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傅修延:《生态江西读本》,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9年。

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主讲的“赣鄱文化的生态智慧”课程，2014年被批准为“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的《生态江西读本》于2019年出版发行，该书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历史上赣鄱文化的发展，揭示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¹不仅如此，傅修延还将自己的生态理念付诸行动和实践。他提出的“关于建议申报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研究报告”，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成为江西省有史以来第一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地区发展战略。²可以说，傅修延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一步一步地参与并见证着赣鄱文化的实践提升的发展进程。

综观傅修延的学术之路，其学术研究始于济慈，随着时间的流逝，兴趣逐渐转向叙事学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学术“初恋”，从未停止搜集有关济慈的中英文资料，同时还将研究江西本土的文化当作自己的使命，坚韧而执着地进行着“赣鄱文化”的研究。在研究济慈的时候，他尝试运用叙事学理论阐释济慈诗歌的成就，在讲述济慈对自然的聆听时，还列举了与老家铅山有关的蛙声蝉鸣。³在叙事研究中，他多次对赣鄱文化的地域文化进行符号叙事学解读，还将此类文章收入著作《中国叙事学》中。⁴他穿梭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又将这些相对独立的领域互相联结，从发生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尝试突破学科界限，念兹在兹地思考着学术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不难看出，“跨学科”确实是傅修延学术研究的底色。

二、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路径

尽管傅修延有着多方面的学术实践，但他最主要的研究领域还是叙事学；傅修延学术研究的跨学科特色，亦最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叙事学的研究之中。下面，我们来探讨其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路径。

傅修延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提到叙事学复兴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其“跨学科趋势”。所谓跨学科趋势，不能简单理解为叙事学跨越自己的疆界“入侵”其他学科，而是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要看到叙事是一种“跨文类现象”。讲故事的人过去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如今各个领域都有优秀的故事讲述人涌现出来，最会讲故事的人甚至可能还在文学领域。万变不离其宗，只有紧紧抓住“讲故事”这条主线，才有可能穿透既有的学科门类壁垒，还原出叙事传统的谱系。一味地拘泥于文学与非文学之分，不仅局限了自己的精神视野，而且不利于各学科之间的互通有无。没有哪种理论工具能为某门学科所

1 参见 傅修延：《生态江西读本》，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9年。

2 参见 林琰：“文学研究的中西比较自觉意识与文化自信傅修延教授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2019）：10-11。

3 参见 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5页。

4 参见 傅修延：“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江西社会科学》8（2009）：46-60；傅修延：“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5）：60-66。

专美，也没有哪种途径是进入其中的“主要入口”，更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入口，似此最好的办法是熟悉各个入口以便适时进入。因此，傅修延的跨学科研究强调突破学科界限，从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广泛征求工具与材料，针对不同问题设计出不同途径的解决方案，力求为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¹这种跨学科研究路径贯穿在其各个学术研究领域中，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治学格局、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和创新，以及“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立场。

（一）对叙事学跨学科本质的思考

作为学科的叙事学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内在属性。对此，傅修延在叙事学研究之始，就有深刻的洞察，并贯穿于其整个研究生涯。

叙事学研究的对象是“叙事”现象，而这一特殊现象并不是某一个学科的专擅，只有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才能在叙事学研究中取得真正的突破。傅修延“喜欢从根本上思考与文学叙事的有关的一些问题”（《叙事：意义与策略》2），对叙事现象以及对叙事学这一学科跨学科本质的思考，可以说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研究过程。

傅修延最早关于叙事学的著作就以“讲故事的奥秘”为标题，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对“叙述是什么”的认识。他认为，不正面回答“叙述是什么”，不深入思考叙述之所以为叙述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就不能发展出有普遍意义的叙述理论，甚至也不能很好地回答“怎样叙述”这个实践性问题。²在之后的研究中，他一直致力于探讨叙事的意义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并将一系列论文收录于《叙事：意义与策略》一书中。在该书中，他强调文学叙事就是讲述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行为或本领，只有从讲故事角度来对待叙事文学，潜心思考叙事何以为叙事这样的基本问题，才能把握住叙事文学的精髓。³

傅修延指出：自20世纪末以来，一些原先看起来与叙事无多大关联的领域（主要是人类学和经济学），出现了把叙事当作人类标志性行为的呼声。他通过几篇长文对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以及叙事学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做了尝试性的解答。在“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从群体维系角度看叙事的功能与本质”一文中，他指出国内叙事学在西方影响下偏于形式论，一些人甚至把研究对象当成解剖桌上冰冷的尸体，然而叙事本身是有温度的。经典叙事学蜕变为后经典叙事学以来，叙事的所指已经泛化，以较为宽泛的观念来考察早期人类的涉事行为，或许能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叙事的本源与本质。为此，他借鉴了人类学家对早期讲故事行为的种种解释，将叙事交流的起点提到语言尚未正式形成之前，认为叙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抱团取暖的行为。人

1 参见傅修延：“导论”，《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33页。

2 参见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3 参见傅修延：“引言”，《叙事：意义与策略》，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7页。

类许多行为都和群体维系有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有牢牢地把握住这种关联，我们今天的研究才不会迷失方向。¹在“人类是‘叙事人’吗？”一文中，他尝试回答“叙事人”之名引出的三个重要问题——何谓叙事、叙事何为和叙事学向何处去，并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叙事，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讲故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因此当前亟须重新审视和思考人类的讲故事行为及新形势下叙事学的发展。除此之外，文中还强调叙事不是文学的专利，叙事学应博采众长、加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方能有更好的作为。²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使他在接下来的“听觉叙事”研究中对叙事的本质有了新的发现。在《听觉叙事研究》一书中，他借鉴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观点，将听觉叙事拈出来做专门研究，指出叙事一开始便与听觉结下了不解之缘，讲故事的“讲”本身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行为。学术专著《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共七卷）更是首次从感官倚重角度比较中西叙事传统，并对“叙事”这一关键性概念作了专门论述，将其还原为讲故事行为，指出叙事最初是一种的诉诸听觉的信息传播，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传媒变革为后世的叙事行为增添了多少手段，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未摆脱对原初“讲”故事行为的模仿。只有紧紧抓住“讲故事”这条主线，才有可能穿透既有的学科门类壁垒，使叙事传统的脉络、谱系与内在关联性复归清晰。³

关于叙事本质的思考贯穿于傅修延的整个叙事学研究中，然而，他认为迄今为止对叙事本质的研究依然是远远不够的。叙事学在西方属于形式论阵营，对叙事的形式构成已经有了许多堪称精深细密的研究，但对于叙事的本质即其固有的属性，迄今为止尚未有令人满意的充分阐释。因此，他认为尽管他在之前的研究中对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以及叙事学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做了一些尝试性的解答，但其中对叙事本质的论述仍然带有某种“迂回包抄”的性质，还不能算是穷根究底的全方位探讨。为弥补这一不足，他通过“叙事的本质”一文，在意识形成与表达的背景上，从认知、逻辑与传播三个层面，正面探讨讲故事行为的发生缘由、组织形态和动力机制。他坚信，只有坚持文学是人学的立场，把问题提到关乎人的本性、关乎文明进步和人类进化的高度，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以及为什么叙事问题会在当下引起如此广泛的重视。⁴

傅修延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叙事有文明维持之功。在叙事传统的惯性作用下，讲好世界变局中的中国故事是当代故事讲述人义不容辞的使

1 参见 傅修延：“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从群体维系角度看叙事的功能与本质”，《天津社会科学》4（2018）：114-127。

2 参见 傅修延：“人类是‘叙事人’吗？——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与叙事学向何处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23）：86-101。

3 参见 傅修延：“总序”，《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刘亚律等著，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0页。

4 参见 傅修延：“叙事的本质”，《天津社会科学》6（2024）：18-42+174。

命。我们既要汲取世代相传的故事讲述方式中蕴藏的智慧，又要探索能适应当前和未来形势的故事讲述方式，为当前倡导的“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学术助力，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继续前行。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了解叙事学的跨学科、跨媒介本质是万万不行的；也正是这种对叙事学学科本质的深入思考，决定了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路径。

（二）打通中外，融汇古今

傅修延的跨学科研究路径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容与研究领域的拓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中国叙事学的研究中。在研究先秦时期的叙事传统时，他指出：“从整个叙事发展史来看，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只是其中的一章，故事在不同时期有不尽相同的载体。单从小说这一种载体入手研究，无异于划地为牢自缚手脚”（《先秦叙事研究·绪论》3）。因此，凡是含有叙事成分的先秦文献，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¹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他在对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做了一番考察后，提出了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其中一条便是“调查范围的扩大”。他认为研究中国叙事诚然是不可能脱离小说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并非只诉诸语言文字这一种媒介。如果一味依赖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本，忽略汇入叙事长河的其他源头活水，我们的研究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在《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书系“总序”中，他再次指出：叙事行并非只诉诸语言文字这一种媒介——学界目前反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呼声甚为强烈，仅凭小说来总结叙事规律的做法已落后于时代。因此，他将系列研究突破以小说为叙事学主业的路径依赖，将主攻对象扩大到包括作为初始叙事的神话、民间种种涉事行为与载事器物、戏剧与相关演事类型、含事咏事的诗歌韵文以及小说与前小说、类小说等门类，并有叙事思想、叙事理论及关键词等方面的研究。他还专设了“民间卷”这一分卷，把以往不受关注的民间谱牒等纳入叙事研究的范围，将这些处于学科边缘又对叙事传统有隐性塑形作用的对象全部纳入叙事学的研究领域之中，使中西叙事传统的面貌呈现得更为清晰和系统。²

除此之外，傅修延的研究对象还涉及饮食、城市、面容等领域。比如，他认为饮食属于人类延续生命的标志性行为，人类为维系生存和改善状态所作的种种努力，一定会通过那些与饮食行为相关的记述反映出来，因此尝试从日常的吃喝行为中，探索饮食叙事的意义与本质³；他还指出：城市叙事关乎人们的未来，每个城市都应当有尽可能多的侧面或曰发展面向，只有包容一切可能性的城市才有前途无限的未来。⁴同时他还与时俱进，时刻关注着当下

1 参见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2 参见 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5-12页。

3 参见 傅修延、钟泽芳：“饮食叙事与互渗思维”，《江西社会科学》1（2023）：134-144+207。

4 参见 傅修延：“城市叙事关乎未来”，《探索与争鸣》10（2022）：5-7。

的科技发展进程，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5G 与物联网的时代正在到来。万物互联理念在当下的传播，使我们古人的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古老与新潮此时的相会令我深深着迷。（……）因此不能把万物一体的思想斥为落后（《叙事学与中国叙事传统》10）。在近两年的关于物叙事的论文中，他从物叙事和符号学角度对广大女性喜爱的丝巾作深入分析，目的在于增进对中国艺术精神与审美传统的理解，并由此见出时代进步和文明互鉴的意义¹；此外，他还从人际沟通与叙事交流角度对人的面容做出新的探索，指出在“读图时代”面容会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其表意功能会在未来借助 VR 之类仿真技术为影像艺术等打开更为广阔的天地，从而为叙事行为带来无穷的新的可能性。²

其次是治学格局上的突破。傅修延认为，在当今学术研究专业分工越分越细的趋势下，固然要做到“术业有专攻”，但是视野过于狭窄会影响到研究的触类旁通。这就要具备全球视野和比较眼光，打通中西和西学，以中西比较研究突破以往中西分隔的治学格局。他指出：“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身的普遍方式，也是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方法，它可以使双方更透彻地洞察对方的特点，参照物的存在又可以为“反观”自身的盲区提供依据。³ 这种比较意识一直存在于他的学术研究中，20 世纪末以来他就有志于从事中西叙事的比较研究。在 1993 年出版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中，对中西叙事传统的相互影响与激荡作出勾勒后，他提出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之后的《中国叙事学》进一步认为：如同人类学认为孤立地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没有意义一样，只有将多个民族的神话相互参照发明，才能见出神话后面的意义与规律。⁴ 他近年来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更是将中西比较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坚持以对中国叙事传统的讨论为主线，西方叙事传统则以副线和参照对象的方式而存在，并以中西叙事理论中的“关键词”作为切入口进行系统辨析，对中西叙事传统展开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比较研究。⁵ 在对“文本学”展开系统研究时，他也强调文本理论并不独属于西方，不能将视野局限于西方一隅，只有海纳百川，兼顾中外，将东西方文论都当作理论建构的基础资源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新世纪的文本学。除此之外，在阐释济慈的诗论观点时，傅修延也会自觉联系中国古代文论，力求互相印证。比如，在谈到济慈诗论中喜欢诉诸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大自然的形象化表达

1 参见 傅修延：“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江海学刊》4（2023）：239-245。

2 参见 傅修延：“论作为能指的面容”，《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2）：44-56。

3 参见 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15-16 页。

4 参见 傅修延：“导论”，《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3 页。

5 参见 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4-148 页。

时,他指出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生态诗论。¹

最后是研究方法上的跨界创新。傅修延广泛使用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更多考察视角以及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他借鉴人类学的观点,将其他民族的叙事传统作为借鉴或参照,尝试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在研究中国叙事传统时,他借鉴了发生学的观点,认为:“叙事传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研究中带一点生物进化的眼光,或许有助于更清晰地勾勒出叙事传统的形成脉络”(《先秦叙事研究·绪论》7)。因此,《先秦叙事研究》从发生学的层面,讨论先秦时期诉诸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叙事形态,通过寻找叙事行为发生、成长与壮大的痕迹,以及观察传世典籍的贡献与影响等,达到勾勒中国叙事传统的目的,从而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结论。²

在对中国叙事学研究范围的圈定上,他借鉴了源自尼采的“谱系学”(genealogy)概念,提出广泛叙事的范围过于宽广,当前的中国叙事学研究应致力于谱系学意义上的调查,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特别能显示中国谱系的对象,让“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脉络浮现,使“已经模糊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复归清晰。³比如在《中国叙事学》中,他对诸多叙事文本、“含事”器物与“涉事”感知等进行知识考古学般的刨根问底,更为清晰地解答了中国叙事传统谱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这种谱系学意义上的调查,为中国叙事传统的源起与形成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系统解释。⁴在对具体的对象进行研究时,他广泛将各种学科理论进行有机糅合。比如,在讨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时,他以当今生态学者大力倡导的整体主义来理解《山海经》中万物之间的依存和共生关系⁵;在《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中,他从叙事与文化角度出发,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易学与中国陶瓷加工结下的不解之缘⁶;在讨论城市叙事中,他借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表述城市叙事是有时态的,那些历尽沧桑却总能浴火重生的城市代表着进行时,虽然年轻却发展乏力的城市相当于进入了现在完成时,因此一座城市如果少有作为甚至停止作为,它便失去了自己的未来。⁷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傅修延叙事学研究打通中外、融汇古今的跨学科治学路径。

(三)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1 参见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5-216页。

2 参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3 参见傅修延:“导论”,《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0页。

4 参见唐伟胜、傅修延:“叙事学与中国叙事传统——傅修延教授学术思想访谈”,《英语研究》2(2020):5。

5 参见傅修延:“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江西社会科学》8(2009):50。

6 参见傅修延:“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11):7-10。

7 参见傅修延:“城市叙事关乎未来”,《探索与争鸣》10(2022):5。

傅修延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取他山之石，攻自家之玉，如果在他山之上流连忘返，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了。因此，在各个研究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他始终秉持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立场。

“以我为主”表现在他时刻谨记立足于自身，即抓住问题的本质以及坚定的本土立场。就拿叙事学研究来说，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现行的学科分类是西方思维的产物，这套分类系统不一定完全适合我们自己的传统，如果一味执着于文史之分，我们便很难理解为什么前人一些评论经常会跳出窠臼，或者是以文论史，或者是以史评文。¹ 坚守本土立场指的是有所“抵制”的“接纳”——不加“抵制”的后果可能是“自我东方化”，而太多的“抵制”又有走向“自我中心”的危险，因此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² 就拿中西叙事传统比较来说，如果过分强调西方的作用，以西方的评判标准来看待中国叙事理论，结果依然会走上以“西”压中，以西“蔽”中的老路；而无限强调本土立场，自我不断膨胀，最终也会演变成为我独尊的民族至上主义。³ 应该看到中西叙事各有不同的来源与传统，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因此，在建设中国叙事学的时候要有所选择地吸纳西方经验，立足于我国悠久的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发掘、整理、建构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

“为我所用”体现为，在他的叙事学研究中一直秉持的“以西映中”的学术理念。所谓“以西映中”就是借他山之石垫牢我们的立足之基，“立足中国的叙事理论资源，将西方叙事理论的思想蕴含、话语方式等作为参照，通过对中国资源的细致梳理，发掘中国叙事理论的思想精髓与发展脉络，努力呈现其理论潜质与话语形态”（《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22）。在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研究的新路径中，傅修延指出：中国当前文论研究中各种西式理论表现强势，本土理论几近失声。因此，当务之急是总结我们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努力构建有本土特色的叙事理论话语系统。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不能画地为牢，搞孤立主义与自我设限，而是积极发挥西方理论的“他者”作用，让其理论特质成为烛照中国叙事理论的窗口。⁴

应该说，“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跨学科治学理念及其具体路径是非常科学的，体现出了一个成功的中国叙事学研究者应有的视野和胸怀。

1 参见 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36 页。

2 关于“自我东方化”和“自我中心”的更多解释，参见 傅修延：“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论纲”，《学术论坛》2（2017）：4-5。

3 参见 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23 页。

4 参见 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16 页。

三、傅修延学术研究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

不管是最初对济慈书信的翻译、对赣鄱文化的关注还是多年来开展的叙事学研究，傅修延始终都有着宏阔的全球视野，并体现出一以贯之的中国立场和对现实的强烈关切。

傅修延认为，文人是承担着继往开来文化使命的人，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延续和发展自身所属的文化。从他最初选择济慈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就已经开始立足于中国了。在翻译《济慈书信集》时，他在“译序”中强调：济慈书信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对自己文艺观的阐发，其书信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国内却缺少完整的济慈书信中译本，中国读者一般只能接触到从济慈书信中摘译出来的片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济慈原意的把握。¹在写作《济慈评传》时，他在“引言”中写道：“诗歌没有国界，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国人最熟悉的是拜伦与雪莱，济慈则藏在他们巨大的身影后面。20世纪风雷激荡（……）当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为讲究艺术品位、更能抚慰人心的诗歌”（《济慈评传·引言》11）。为此他主张倾听济慈那夜莺般的动人歌声，接受他身上人文艺术精神的感染，以重燃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激情，使生活恢复应有的诗性。²正如傅修延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的：他之所以研究济慈，最终还是为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如果没有这种初衷，做任何研究都会缺少驱动研究的激情。³

这种中国立场还体现在他对本土资源的重视。在早年关于赣文化的著作中，傅修延写道：“赣文化讨论紧连着我们的‘根’，将我们拉向脚下这片生身立命的红土地。我们是在承接过去，创造现在，影响未来”（《赣文化论稿》，“自序”1）。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赣鄱文化”研究中，他多次强调学问要和事功结合，读书人不能脱离自己脚下的大地，应该把自己的思考与自己生身立命的地域文化连接起来，把论文切实地写在故乡的大地上。他在做比较文学就贯彻了这种理念，许真君传说、陶渊明诗文、浴仙池（洗马池）故事和江西的生态文化传统，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他甚至还因为研究南昌的浴仙池故事而成为这个传说的非遗传承人。⁴对乡土文化的关怀，使他在之后的研究中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与脚下的大地连接起来。他在《中国叙事学》中探讨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时，特意强调了“地方性知识”的介入。他指出：“中国目前的叙事学研究尚未进展到可与西方相颉颃的地步，理论语

1 参见傅修延：“译序”，《济慈书信集》，约翰·济慈著，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2 参见傅修延：“引言”，《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3 参见唐伟胜、傅修延：“叙事学与中国叙事传统——傅修延教授学术思想访谈”，《英语研究》2（2020）：9。

4 参见傅修延：“传承赣鄱文化薪火的千秋工程”，《当代江西》6（2022）：59。

言的捉襟见肘常使我们感到‘底气’不足，为此需要尽快建立能接上自己‘地气’的话语体系”，“让‘地方性知识’介入进来，我们不但会发现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叙事，还能洞察到这一方叙事的许多奥秘，这些都是戴着别人‘眼镜’所看不到的”（《中国叙事学·导论》36-37）。

在叙事学研究中，傅修延认识到：中国学界自觉的叙事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的发展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始终存在一个未能有效突破的瓶颈，即：“西方叙事理论风骚独领的格局没有彻底打破，本土叙事依然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建设的路途之上，契合中国叙事传统的理论话语系统远未确立”（《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15）。为此，他多年来一直在为推动中国叙事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叙事话语系统找寻新的路径。他反复强调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认为走向各民族自己的传统并不意味着背朝外部世界，研究中国叙事传统不仅有益于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更有助于使诞生于西方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傅修延指出：叙事传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一大意义在于形成于过去又不断作用于当下。世代相传的故事及其讲述方式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我们只有回过头来认真观察自己的叙事传统，才可能想清楚今后向何处去，才能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的新形势中，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¹总而言之，在傅修延看来，作为一个现代中国学人，要真正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大家，甚至要在任何学术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都是缺一不可的。

结语

从济慈研究、赣鄱文化研究到叙事学研究，从西方文学到中国古代文学，从普适性理论到“地方性知识”（……）傅修延深深地将自己的学术根系扎根入中国文化这片沃土，一直念兹在兹地思考着学术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而贯穿于其研究历程中的始终是跨学科的底色和路径。正如他在其第一本叙事学理论专著《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中所说的那样：“人类的活动永无休止”，写小说对他来说是年少时未曾实现的“可能的世界”²，他曾为此黯然神伤，而如今他已在各个学术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近年来，他仍坚持在叙事学领域笔耕不辍。2022年，由他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结题评审，并荣获“优秀”等级。这项课题以《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七卷本为最终成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

1 参见 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6页，第45-53页。

2 参见 傅修延：“后记”，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84-285页。

发行¹，向我们展示了傅修延近年来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所做的极大努力和巨大贡献。他站在中西理论和古今知识的交叉交汇交融之处，以跨学科视野为我们比较中西叙事传统，向我们揭示“讲故事的奥秘”，也实现着他心目中的那个学术的“可能的世界”。

Works Cited

- 傅修延：“互文的魅力：四大民间传说新释”，《江西社会科学》4（2014）：205-214。
- Fu Xiuyan. “The Charm of Intertextualit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Great Folktale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4 (2014): 205-214.]
- ：《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Chinese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15.]
-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论纲”，《学术论坛》2（2017）：1-6。
- [— “A Comparative Outlin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raditions.” *Academic Forum* 2 (2017): 1-6.]
- ：《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 [— *Critical Biography of John Keat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8.]
- ：“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江西社会科学》5（2008）：23-44。
- [— “Discussion on the ‘pre-narrative’ on bronze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5 (2008): 23-44.]
- ：《生态江西读本》。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9年。
- [— *Ecological Jiangxi Reader*. Nanchang: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2019.]
- ：“‘亘古奇才未尽年’——论济慈与李贺”，“在美女蛇的故事后面——《拉米亚》与《白蛇传》”，《比较文学三百篇》，智量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661-665页，第701-704页。
- [— “‘The Eternal Genius Never Dies’: On Keats and Li He,” “Behind the Story of the Beautiful Snake: *Lamia* and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Three Hundred Articl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ited by Zhi Lia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0. 661-665, 701-704.]
- ：“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9（2007）：26-38。
- [— “The Evolution of Fu and Chinese Narrative.”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9 (2007): 26-38.]
- ：“羽衣仙女与赣文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00）：107-118。
- [— “Feather Fairy and Gan Culture.”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00): 107-118.]
- ：《赣文化论稿：留住我们的集体记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1 这七卷分别为：刘亚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赵炎秋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叙事思想卷》；张开焱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神话卷》；杨志平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小说卷》；欧阳江琳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戏剧卷》；周兴泰等，《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诗歌卷》；曾斌，《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民间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 [—, *Gan Culture Essay: Retaining Our Collective Memory*.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 : “美的赞歌——读济慈的几首诗”，《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五集），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20页。
- [—, “Hymns of beauty: Reading Several Poems by Keats.” *Selected Reviews of World Literary Masterpieces* Vol.5, edited by Jiangxi Foreig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9-20.]
- : “元叙事与太阳神话”，《江西社会科学》4（2010）：26-46。
- [—, “Meta-narrative and Sun Mytholog.”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4 (2010): 26-46.]
- : 《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The Modern Value of Keats' Poetry and Poetry Theory*.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 《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 [—, *The Mystery of Storytelling: Literary Narrative Theory*.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3.]
- : “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江西社会科学》8（2009）：46-60。
- [—, “On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Narrative’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8 (2009): 46-60.]
- : “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11）：3-19。
- [—, “Porcelain Narrative and 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2011): 3-19.]
- : 《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 [—, *Research on Auditory Narrative*. Beijing: Peking UP, 2021.]
- :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 [—, *Research on Pre-Qin Narrative: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Beijing: Oriental Press, 1999.]
- : “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5）：60-66。
- [—, “A Semiotic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XU Xun Legend.”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15): 60-66.]
- : “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江海学刊》4（2023）：239-245。
- [—, “Silk Scarf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4 (2023): 239-245.]
- : “论作为能指的面容”，《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2）：44-56。
- [—, “Study on the Face as Signifier.”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22): 44-56.]
- : 《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Textology: A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Theory in Textualism*. Beijing: Peking UP, 2004.]

——：“城市叙事关乎未来”，《探索与争鸣》10（2022）：5-7。

[—.“Urban Narrative is about the future.”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10 (2022): 5-7.]

傅修延、卢普玲编：《江西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Fu Xiuyan and Lu Puling, eds. *Jiangxi Culture*.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傅修延、钟泽芳：“饮食叙事与互渗思维”，《江西社会科学》1（2023）：134-144+207。

[Fu Xiuyan and Zhong Zefang. “Gastronomy Narrative and Mentality of Participation.”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1 (2023): 134-144+207.]

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Keats, John. *Keats Letters*, translated by Fu Xiuyan.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2.]

刘亚律：《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傅修延总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Liu Yalv.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raditions (Key Words)*, edited by Fu Xiuyan. Beijing: Peking UP, 2024.]

林瑛：“文学研究的中西比较自觉意识与文化自信傅修延教授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2019）：1-12+363。

[Lin 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parative Stanc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Literary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u Xiuya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 (2019): 1-12+363.]

龙迪勇：《跨媒介叙事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年。

[Long Diyong. *Research on Intermedia Narrative*. Chengdu: Sichuan UP, 2024.]

——：《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Spatial Narratolog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文本与文本主义文论——读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创作评谭》2（2005）：49-52。

[—.“Text and Textual Literary Theory: Reading Fu Xiuyan's *Textual Studies: A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ual Literary Theory*.” *Creative Criticism* 2 (2005): 49-52.]

唐伟胜、傅修延：“叙事学与中国叙事传统——傅修延教授学术思想访谈”，《英语研究》2（2020）：1-12。

[Tang Weisheng and Fu Xiuyan. “On Narratology and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 Fu Xiuyan.” *English Studies* 2 (2020): 1-12.]

邹道文、傅修延编：《赣文化：从大京九走向二十一世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Zou Daowen and Fu Xiuyan, eds. *Gan Culture: From Beijing-Kowloon Railway to the 21st Century*.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